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

创造社资料

本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100号

I209.6

31

2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

创造社资料

下

饶鸿兢 陈颂声 李伟江
吴宏聪 张正吾 董修智 王佩娟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B003052



六 回 忆 录

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

达 夫

创造社的历史并不长，记得是在六七年前。（大约是一九二〇年前后的事情吧？）那时候我还在东京帝大的经济学部念书，资平在同校的地质学系，仿吾在造兵科。有一天春天的下午，我们三人，约了田汉到我的寓楼上来谈天，打算合起来出一个文学杂志。当时我和资平住在不忍池边上的池之端一位同学的二楼上，官费正在闹荒的时候，所以我们穷也穷到了极点。那一天午后，我和资平，二人合起来出了一块钱买了一块钱的橘子，打算开会的时候，大家吃的。等到午后二点多钟，仿吾如约来了，而田汉终究不到。我们把橘子吃完，看电灯上了火，田汉还是不来。我与资平，只好自认晦气，白化了一块钱，会终究开不成功。仿吾背上书袋，临走的时候，也只叫了几声“马鹿！马鹿！”

这时候，沫若在九州帝大的医科，他时常有信和诗寄来，竭力的促成我们结一个团体，来出一种杂志。所以那一天他虽然没有从几千里路跑来参预这一块钱的橘子会，但仿吾却把他的信和诗稿，一齐带来，作他对于我们的提议。

第一次的会，终于是这样的流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仿吾回国，在上海一家书局里当编辑。三四月间，他仍复想回日本，函促沫若来上海代他的职，这时候我因为肠胃不好，进了东京的一家病院。沫若接到了仿吾的来信，犹豫不定，且同时又听见了我的病，他就从日本的西南，跑了几千里路，到东北来看形势，同时也来看看我的病，他在西京停留了一日，和京都帝大的同学

郑伯奇等接洽了一次。把出杂志，出丛书的计划，约略和大家谈了一谈。到东京之后，也会了田汉，徐祖正等。在病院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就匆匆的回去了。

这一件事情我曾经做过一篇《友情和胃病》的短篇小说，文笔拙劣，而且只在一个小报的末尾上登了几天，所以没有人注意过。我现在已经把它修改了一遍，编在全集第二卷的《鸡肋集》里了。

到了夏天，沫若决意回国，到上海的时候，就把我的《沉沦》，和资平的《冲积期化石》催去付印。先此，他已经把他在报上杂志上发表过的诗歌剧曲收集起来，出了一本《女神》（《女神》和后出的《星空》，现在我们在请他修改付排，大约本年年内，可以合起来出一本沫若的全诗集）。

他在上海住到了秋天，似乎厌起来了，想回日本去，一边在促我回上海来替他的职，我于那一年的九十月之交回国，一边转赴安徽去教书，一边就担负了沫若交下来的《创造》季刊编辑的重责。

这时候创造社的旗帜，已经张起。创造社丛书一两册，也已经在市场上销售了。（前后的详细情形当另外撰文记述。）

在安庆住了半年，日日编讲义，忙于授课，把《创造》季刊编辑的事情搁起。中间又遭了几个军阀摧残学校的惨事，年底下同逃难似的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才把季刊第一期的稿子交出。急忙赶到东京，去提出论文，受毕业考试，急急乎殆哉，我在东京车站下车的第二日，学校就开始考了。

这一年的夏天，仿吾赴湖南教书去了，沫若于暑假中回上海，暑假后又返日本，编了一期第二期的季刊。

我在日本住到第二年的春天，因为留日学生官费问题回国，在杭州住了一个月，办了一点小小的交涉，正想折回东京去的时

候，安庆又来催我去教书了。

这时候沫若也已回国，我在安庆住得不久，就也回来到了上海，仿吾也从长沙，赶到上海来和我们同住。嗣后两年，我们一边在饮书局的薄醴，一边更在受社会上已成名的诸人的反对，苦战恶斗，拚命的吃苦，拚命的做文章。这中间就出了几期季刊，一年周报，和一百日的《创造日》。这中间我们的苦况，在沫若的作品里，我的作品里和仿吾的大刀阔斧的论战文里，都可以看得出，此地不再说了。

两三年的苦战之后，矢穷弦尽，再也不能支持了，我们三人就一哄而散，仿吾回湖南，沫若去日本，我也逃往北京去，依靠我的哥哥。

其后沫若又回到上海来，做了一年的穷文士，我去湖北，在武昌大学教了半年书，仿吾也在长沙一个有名无实的铁工厂里当厂长。

这中间过得最安适的，是僻处在广东焦岭的矿山中的资平。他老先生在那里娶了老婆，生了儿子，受了一般人的尊敬，一面在矿山当技师，一面还在一个中学里教书。后来不知怎么的风色一转，他辞了矿山的技师，跑上武昌当时的师大去教书了。

我于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和一位北大的朋友去武昌的时候，第一个来接我的，是领着小孩的资平，三四年不见，他竟长得胖胖，象一个小资本家了，虽然他的衣服穿得很蹩脚。

武昌的改设大学，是我们去了以后的事情，当时我和校长石先生，是主张聘沫若去当文科学长的，那里知道一位卑污狗贱的李什么蛋和一位同样的什么什么，从中捣鬼，硬想把师大改国立大学的计划打破，并且因为饭碗问题，就暗中阻止沫若的来武昌就职。我们在武昌，又和这些狗仔苦战了半载，终于被它们咬走。这一年的夏天，却逢仿吾也自湖南来武昌，我和资平二人，

就竭力怂恿他出来办出版部。我们三人只在武昌印章程，拉股子，一边在上海计划奔走的，却是沫若和全平。

一九二五年的冬天，我自武昌下来，到了上海，和沫若等议决，将创造社出版部弄起，一面编印《创造》和《洪水》，一面再来出书。可是事不凑巧，这一年的冬天，染了吐血病，所以只好到杭州病院里去养了两个月病。这中间，为出版部出力奔走的，只有全平和沫若两人。

到了一九二六年——就是去年的春天——我从杭州肺病医院出来到上海的时候，出版部已经租下了闸北宝山路三德里的房子，一块小小的招牌，也已经挂上了。

其后我们去广州，担负编辑筹股等事，全平等在上海作印刷门市批发等工作。不幸去年一年中间出书不多，又因年终时局不靖，创造社被封了一次以后，风鹤时惊，弄得一般办公者，无心专业，所以结算下来，却只够开销伙食，而一般出资股东的红利，到现在还没有分发。

现在我们出版部的事情，由我一个人负责来办了，却又当一周年将满之期，我们虽则能力薄弱，然也想尽我们的至善，为社会谋一点福。然而大事须从小事做起，光吹大炮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当这周年纪念的时候，先出这一张小小的周报，一边奉送给拥护我们的股东，爱读者，及同情者，作一个秀才的人情，一边也想以粗浅的文字，低廉的价目，来灌输些较新较彻底的知识。朋友诸君，我们大家应该联合起来，要干什么便干什么，先从这暗无天日的上海做起。

3.13.1927.

原载1927年3月19日《新消息》周刊创刊号

文学革命之回顾（摘录）

麦 克 昂

四

末了我们来批判创造社的一团。

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特起的。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当时都还在日本留学，团体的从事于文学运动的开始应该以一九二〇年的五月一号《创造》季刊的出版为纪元（在其一两年前个人的活动虽然是早已有的）。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又算到了第二个阶段。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张却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他们以“创造”为标语，便可以知道他们的运动的精神。还有的是他们对于本阵营的清算的态度。已经攻倒了旧文学无须乎他们再来抨击，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却是所谓新的阵营内的投机分子和投机的粗制滥造，投机的粗翻滥译。这在新文学的建设上，新文学的价值的确立上，新文学的地位的提高上是必经的过程。一般投机的文学家或者操觚家正在旁若无人兴高彩烈的时候，突然由本阵营内起了一支异军，要严整本阵营的部曲，于是群议譁然，而创造社的几位分子便成了异端。他们第一步和胡适之对立，和文学研究会对立，和周作人等

语丝派对立，在旁系上复和梁任公，张东荪，章行严也发生纠葛，他们弄到在社会上成了一支孤军。

其实他们所演的脚色在《创造》季刊时代或《创造周报》时代，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在替资产阶级做喉舌。他们是在新兴资本主义的国家，日本，所陶养出来的人，他们的意识仍不外是资产阶级的意识。他们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要求，他们蔑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这内在的要求，自由的组织（大意见《创造》季刊二期的《编辑余谈》）无形之间便是他们的两个标语。这用一句话归总，便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表现。个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精神。他们在这种意识之下，努力行动了，努力创造了，然而结果是同样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不能遂其自然成长的诅咒，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结果，依然不外是一些不具体的侏儒，划时代的作品在他们的一群人中也就终竟没有产出！

然而天大的巨浪冲荡了来，在五卅工潮的前后，他们之中的一个，郭沫若，把方向转变了。同样的社会条件作用于他们，于是创造社的行动自行划了一个时期，便是“洪水”时期——《洪水》半月刊的出现。在这时候有潘汉年，周全平，叶灵凤等一批新力军出头，素来被他们疏忽了的社会问题的分野，突然浮现上视界里来了。当时的人称为是创造社的“剧变”，其实创造社大部分的分子，并未转换过来，即是郭沫若的转换，也是自然发生性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识。（这个目的意识是规定一个人能否成为无产阶级真正的战士之决定的标准，凡摆脱不了这个自然生长的意识的，他不自觉的会退出革命战线。）

然而在这时期中他们内部便自然之间生出了对立，便是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对立。明白的说便是无产派和有产派的对立。郁达夫在郭沫若参加了实际革命的期中，他把创造社改组了，把周，

叶，潘诸人逐出社外，实际上就是这个对立的表示。一方面郭在参加革命，另一方面郁偏在孙传芳的统治期中骂“广东事情”。一方面郭在做《文学与革命》，另一方面郁便在骂提倡无产文学的人是投机分子。郁对内部取出清算的态度，对外部却发挥出他的妥协的手腕。他一方面做着创造社的编辑委员，另一方面又在参预以胡适之为主席的新月会议；以后更在《小说月报》中做《二诗人》的小说来嘲骂创造社的同人，那时候一批读着郁达夫所编的《洪水》的人，他们异口同声的说，这是创造社的《现代评论》化！

郁达夫一人的反动，敌不过的依然是整个的中国社会的潮流，他的行动在不久之间受了不甘反动的创造社同人的反对，他自己便不能不退出了创造社的队伍，并且率性专以嘲骂创造社为能事了。

不久之间到了一九二八年，中国的社会呈出了一个“剧变”，创造社也就又来了一个“剧变”。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来，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就退下了战线。创造社是已经蜕变了，在到一九二九年的二月七日他便遭了封闭。

这是创造社一派的十年的回顾，它以有产文艺的运动而产生，以无产文艺的运动而封闭。它的封闭刚好是说无产文艺的发展，有产文艺的告终。

有水龙飞驰的地方总是有火灾的，朋友，你如看见有多数的水龙在拼命的飞驰，你可以知道燎原的火灾是已经逼近！

一九，一，二六。

原载1930年4月10日《文艺讲座》第1册

“眼 中 钉”

郭 沫 若

L. 兄把《萌芽月刊》第二期中鲁迅先生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一篇文章剪寄了给我，我读了。

这篇文章虽是随意的叙述，却颇有意义。因为我们在这儿可以看见一个小团体内起了自我批判，鲁迅先生对于“语丝派”的以往的关系，及“语丝派”的各个成员在社会上所演的脚色，我们算得到了一个具体的认识，虽然有些地方还不免朦胧。而且鲁迅先生要算是超克了“语丝派”的这个阶段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了。

我现在要来写这篇文章不是要来批评，却是要来辩正一个事实。

鲁迅先生说：

“经我担任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原刊第四七页）

这句话可是事实，但他对于这“警告”、“禁止”、“围攻”的社会意义，却不曾认明，特别是他对于“围攻”的认识，是使我草出这篇文章的动机。

鲁迅先生说：

“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

待下一回再说罢。”（原刊第四八页）

鲁迅先生的“下一回再说”是否已经写出，我还不曾看见，不过便单就这简单的几行字句看来，便可以知道鲁迅先生于认识上不免有错误，于事实上不免也有错误。“艺术之宫”的把守者的“攻击”和“革命”者的“攻击”，意义是两样的。老实说前期的创造社的几个人要谥以“艺术宫守”的尊号，他们的资格还不配，这话说来也未免太长，暂时寄放在这儿，让我追溯一些创造社的几个人对于“语丝派”的几个人所发生过的文字上的关系吧。

一口说创造社的几个人，其实所谓创造社的人并没有几个。拿前期的来说，顶着创造社的担子在实际上精神上都发生过一些作用的，仅仅郁达夫、成仿吾和我三个人而已。

就在这三个人里面，据我所知道的，达夫对于“语丝派”的人便从没生过恶感。

仿吾批评过鲁迅的《呐喊》，批评过周作人的小诗。

我呢，对于周作人之介绍小诗略略表示过不满的意思（见《创造》季刊二期批评《意门湖》的文字里面），对于他提倡印象批评也说过不赞成的话头。（见《创造周报》一篇谈批评的文字里，连题名我都不记得了。）关于鲁迅呢，我只间接的引用过他的一句话，便是“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见《文艺论集》中《天才与教育》），而且我还承认他的并不是“傲语”。

前期创造社的几个人和“语丝派”的几个人所发生过的关系就只有这一点（其实当时《语丝》还没有出现）。

结果还只是成仿吾和我谈驳过周作人或鲁迅而已。所谓“历史”就只有这样一点历史。

再说到我们的谈驳是否是有意的“攻击”？

在这儿要夹叙一下。“攻击”这个字在一般人是很忌避的。大抵被批评者总爱把“攻击”这个字样去谥定批评家，而批评家总兢兢于要辩护，说“我不是攻击”。但在我们现在看来，凡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的立场上所施行的战斗的批评，实质上就是“攻击”。所以“攻击”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上说来是批评的要素。

“攻击”是美名，“攻击”是无须乎忌避的。

但是我们前期的那一些谈驳文字可以配得上称为“攻击”吗？

在当时的所谓“语丝”也，所谓“创造”也，所谓周鲁也，所谓成郭也，要不过一丘之貉而已！说得冠冕一些是有产者社会中的比较进步的“因迭里根洽”的集团，说得刻薄一些便是旧式文人气质未尽克服的文学的行帮和文学的行帮老板而已。成郭对于周鲁自然表示过不满，然周鲁对于成郭又何尝是开诚布公？（例如周作人先生便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始终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这是我自己在这儿坦白地招认的。

自然我对于周作人先生的鼓吹小诗和提倡印象批评，就到现在我也还是反对，不过认识更明瞭了一些，不再是那种意气的反对，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了。

仿吾的《〈呐喊〉批评》，我不能说什么话，因为《呐喊》我并未曾读完，仿吾的文章也没在我的手里。不过我相信仿吾站在现在的立场来，恐怕他的批评又不同。那些以往的批评我们是用不着再去批评。就在当时，他的见解也不见得和我们几个就是一致。

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所读的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是《发的故事》，是民国九

年在《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看见的。这可以说也是我第一次看见的中国的近代小说。我当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这话是我一点加减乘除也没有的表白，这假如值得说上“批评”，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截到他的《呐喊》为止，就是这样。

《呐喊》我是没有读完的。在初出版时（民国十二年），我曾请泰东书局买过一本（当时我寄居在泰东的编辑处）。有一天礼拜日我带着孩子们到吉司菲尔公园时，是带着《呐喊》同去的。我睡在草地上从前面翻读起，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我得的印象依然还是前几年读《发的故事》时是一样。但终因和自己的趣味有点反驳的原故，所以读了三分之一之后终究没有读完。达夫虽曾对我说过，《故乡》很不坏，《阿Q正传》也很有一读的价值，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

这便是我以前对于鲁迅先生的模糊的认识，我相信和仿吾的见解，一定有多少不同。

至于说到最近两三年来“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围攻”，那情形完全是两样的。

中国的文艺运动在最近两三年来完全进展到了另一种新的阶段，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创造社已经不再是前期的创造社了。便宜上我们称那最后一两年的为后期的创造社吧。后期创造社的几位主要的成员，如彭康，朱磐，李初梨，冯乃超诸人，他们以战斗的唯物论为立场对于当前的文化作普遍的批判，他们几位在最近的新运动上的成绩是不能否认的。

他们的批判不仅限于鲁迅先生一人，他们批判鲁迅先生，也决不是对于“鲁迅”这一个人的攻击，他们的批判对象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

所以后期创造社的批判和前期创造社的驳斥，在意识上完全不同。新的批判自然是历史的成果，是一般社会的历史的成果，然而在狭隘的小团体的范围之内决没有什么“历史底”或传统的关系。

最好又拿我自己来说吧。

当在一九二七年的年末，那时鲁迅先生在上海，我也从广东回到了上海。伯奇光慈诸人打算恢复《创造周报》，请鲁迅先生合作，这个提议我是首先赞成的，记得在报上还登载过启事，以鲁迅先生为首名。我当时并曾对伯奇不止说过一次，有机会时很想和鲁迅先生面谈；但不久我病了，所以这件事情竟没有实现。至于《创造周报》的没有恢复是因为大家的意思以为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所以废除了前议，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

这些往事我现在把它写了出来，可以证明创造社的几个人对于鲁迅先生是并没有什么成见。

然而批判之实质就是战斗。在后期创造社的批判一开始，在内部便生了分化，如张资平先生便是这样分裂出去了。在外部便形成了对于鲁迅先生的“围攻”——但与其说是“围攻”，宁可说是激战。因为鲁迅先生守着“语丝”的城堡是在努力应战的。

以往的情形大抵就是这样。总归成一句话，便是创造社的几个人并不曾“将语丝派的几个人看成眼中钉”。

好在创造社这个小团体老早已经是失掉了它的存在的，“语丝派”这个小团体现在已由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扬弃了。我

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我们的眼中不再有什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什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什么钉子——自然站在新的立场上来的“眼中钉”是会有，我们就不必把别人看成钉子，别人是要把钉子钉在你的眼里——然而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

原载1930年5月10日《拓荒者》月刊

第4、5期合刊（又名《海燕》）